

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

戴 枫

摘 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場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目前，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在要素和资源市场中，技术和数据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应该先行。在市场基础制度与规则建设中，建立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该是眼下的重点制度建设领域。

关键词 全国统一大市场 内循环 外循环 动力

一、引言

2021年12月1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場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并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纲领和工作指南。基于此，本文将从畅通内循环、重构外循环以及联通内外循环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和论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也是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的内在要求。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内循环的基本规则

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国内循环的畅通无阻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前提。一国经济活动的本质是要素、资源、商品和服务在厂商、政府和家庭等市场主体之间循环流动的过程。在不考虑进出口部门的情况下，本国的政府和家庭是要素和资源的供给方，同时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方；本国的厂商或企业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同时也是要素和资源的需求方。国民经济要想循环起来，就需要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而商品和服务市场及要素和资源市场则是供给端与需求端相互连接的核心通道（图1）。健全的市场体系及规范的市场秩序是市场机制发挥调节功能的前提，也是产业链上各种产品和要素进行有机衔接实现循环畅通

戴枫，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内国际双循环下内需诱致中间品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2BJL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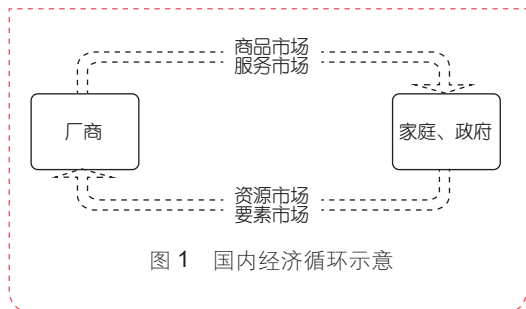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经济循环示意

的保障。

经过四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日臻完善，产品自由流动的障碍逐渐消除，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品的供给质量和需求层次之间的不匹配。与之相比，要素和资源市场的改革较为滞后，要素和资源通道的堵塞是国内经济循环出现梗阻的主要原因。即便是产品市场存在的质量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其根源也在于要素资源的错配（杨新铭和刘洪愧，2022）。因此，畅通内循环的关键在于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进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目前，我国要素和资源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和运行规则，要素资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市场的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目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是资本市场。能源要素因其安全性和清洁性而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因此我国能源产品供给的计划特征更为明显，市场化相对不足。一些传统能源虽然建立了交易市场，但是区域性较强，交易活跃度较低。而一些新型要素，如技术、数据、碳排放等要素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交易机制不完善。

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和数据要素对于我国产业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来说，

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尤其是数据要素，可以在生产端与其他要素相融合，形成乘数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以需求端与消费平台相融合，提升服务质量和消费体验。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但是数据知识产权与一般知识产权特征存在区别，大量抽象数据知识产权被排除于《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客体之外，缺乏专门的立法保护。除了顶层的立法缺失以外，我国数据市场还缺少完善的监管机制。当前的数据监管主要是由公安机关、网信部门和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共同执行，职能分散，未能形成合力，导致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不畅，监管效率有待提高。在交易机制上，由于数据不同生产环节的主体贡献较难评价，数据在不同场景的应用价值也有所不同，因此，数据要素的定价标准不统一。此外，数据市场的进入与退出规则、竞争规则和交易方式等都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难以保障和约束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之类似，新兴的生态环境资源市场，同样存在要素确权、定价机制、行业标准、交易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的不规范和统一，市场交易活跃度不足。

由于对要素的需求是产品市场的派生需求，同时也是对多要素的联合需求，要素资源市场的发育程度不均衡，一方面会导致要素市场不能及时对产品市场做出反应，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生产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因反应时滞不同而不能协同配置，最终导致供给端的阻滞，经济循环不畅。

（二）要素市场分割，要素资源的流动性不充分

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要素市场

分割现象严重，阻碍了要素资源在地区间、城乡间、部门间，以及不同市场主体间的自由流动。在土地要素市场，城乡二元分割较为突出，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流转改革等措施虽相继出台，但由于缺乏兼顾激励与成本的体制机制，土地调配仍然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同地不同权、土地征收补偿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在资本要素市场，各类金融机构仍然存在地方保护现象，跨地区的金融服务受到较多限制。市场准入的歧视仍未消除，非国有制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种种“银政壁垒”造成了金融资本的割裂状况，限制了资本的跨区域和跨市场主体的流动。

在劳动力市场，当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主要障碍。一些城市落户的高门槛，使得外来就业人员在享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难以完全保障。劳动力流动受限是造成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Li & Lu (2021) 发现，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人均 GDP 的差距上。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城市间 GDP 规模的差异和人口规模的差异都小于美国和日本，但城市间的人均 GDP 差异是美日的两倍多，主要原因是美、日等国的经济和人口同步集聚，中国的人口集聚则滞后于经济集聚。而我国人口集聚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户籍制度，既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又限制了人才的社会性流动，造成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区域失衡，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和国内大循环基础的建立。

与传统要素相比，技术和数据市场及

能源和环境市场的交易系统、流程和场所尚不规范，认证标准不统一，这些因制度设计漏洞而造成要素资源充分流动条件不具备。不充分的要素资源流动会让深化供给侧改革“如鲠在喉”，进而无法保障商品服务市场的规模、质量和超大规模优势的发挥。

（三）要素价格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

要素市场的分割及地方政府对要素配置的直接干预，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价格机制对要素流动的引导功能失效，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比如，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要素和生态环境要素的成本被人为压低，而资本利率管制价格偏高。这一方面会造成劳动者收入占比较低，出现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剩的需求结构失衡；另一方面会造成企业生产偏好低成本要素密集产业，形成低端锁定局面。一些能源矿产等稀缺要素的配置权和定价权由政府掌握，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企业对于稀缺要素的获取成本可能附加政府的寻租成本。企业的生产成本通常存在刚性，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善又要增添额外的体制成本，进一步造成产品价格的扭曲和产品市场的供求失衡。

在数量赶超战略下，政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各地政府将 GDP 增速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而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因为见效快而成为政策的扶持重点。地区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导致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部分行业过度集中，进而出现区域产业结构雷同和产能过剩。而这种高投入产业常常意味着高退出成本，当企业面临淘汰时，一些地方政府宁愿企业亏本经营也不允许其退出市场，甚至阻



止其破产行为。地区间缺乏协调合作机制，过剩产能难以跨区域转移或重组。无效供给的“僵尸企业”因为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而无法释放生产资源，导致高效率高活力企业的生产受到人为的资源约束，致使社会生产偏离帕累托最优的生产组合。要素资源错配既会在供给端制约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产品质量的优化，又会在需求端抑制高质量产品需求和造就消费模式的低端锁定、内需潜能释放不足的问题，需求端和供给端双重冲击就会阻断内循环的畅通运行。

由此可见，要想我国经济循环畅通，关键是要打破要素市场的区域分割和行政干预，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高效配置。当前要素资源市场存在种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则的缺失。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市场准入条件，统一市场交易规则，统一市场监管标准，统一市场法治体系。其本质内涵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一切导致市场分割的人为障碍，打造统一的要素与资源市场，以及高水平统一的商品和服务市场。

统一大市场边界清晰，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明确，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及其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对微观主体的干预过多及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等问题，进而消除要素资源错配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统一的市场制度和规则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以资源配置的优化提升供给质量，以要素价格的回归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张，以要素资源市场的协同均衡带动商品服务市场的高效匹配，最终清除供给端、需求端及二者联通路径中的瘀点堵

点，实现内循环的畅通无阻。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重构外循环的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国内市场容量不足，难以消化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基于廉价劳动力优势，采取客场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鼓励出口，利用国外市场来带动国内经济增长，是符合当时的现实需要和比较优势，也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人均 GDP 水平已经由 1978 年的 156 美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12 622 现价美元，增长了近 80 倍。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发生变化，长期的“两头在外”式的外循环模式也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日趋加剧。

（一）国际收支失衡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赶超战略的成功经验。中国大陆一方面借鉴东亚模式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吸取拉美债务危机的教训，以加工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突破口，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利用外资的首选方式。各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常以“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外资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力军。这些企业以来自发达国家的成本驱动型跨国公司为主，它们依靠进口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及中间产品，利用本地的低成本要素加工为制成品，再大量出口销往国际市场。

这种依赖国际资本与市场的外循环，形成了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的“双顺差”

格局。表面上看，我国从贸易顺差中赚取了大量外汇，但实际上，由于资本项目的管制较为严格，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受限，尽管我国在 2002 年之后实行鼓励企业“走出去”战略，但本土企业由于缺乏海外投资的战略眼光和经验，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且收益率较低。大量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更多的是用来投资黄金和美债，虽然净资产为正，但实际投资收益为负。与此同时，外汇储备的增加相当于扩大了我国的基础货币供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带来冲击，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此外，长期国际收支失衡也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使我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点目标，影响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区域发展失衡

我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东部沿海地区，从最早的 5 个经济特区和 14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到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等沿海经济开放区。“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对跨国运输较为敏感，由于海运成本低，70% 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进行，沿海城市自然成为企业布局的首选区域。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 and 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实现率先发展，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龙头”。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理论和增长极理论，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在短期内会造成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但在长期，可以通过点、线面的辐射效应以及前向、后向的连锁效应带动中西部区域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发展的均衡。

可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东部地区国土面积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但 GDP

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50% 以上，且在 2005 年达到峰值 59.02%，2006 年之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作用下有所下降，但始终是中西部地区的 2 倍左右，区域发展失衡现象依然严重。为什么地区辐射效应没有起作用？刘志彪和张少军（2009）认为东部地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时定位在低端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在了原材料和劳动力要素供应商的地位，使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刘瑞翔等（2020）也证实，由于中国东部地区企业大多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关联较弱，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对内陆省市的拉动效应并不显著。

（三）创新能力失衡

出口导向型经济下国际循环的逻辑是，引进外资→进口原材料与机器设备→加工装配→出口最终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是“进口引致型出口”的产业发展模式（巫强和刘志彪，2009）。国内的生产链条很短，主要是终端生产环节和一些非核心的原材料供应环节。“出口中学”的效应主要体现在，我国对于引进的成套设备和一些终端产品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本土技术能力和制造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终端产品生产能力，并对部分进口产品和设备进行替代，如核电、高铁、工程机械和通信设备等。

但对于一些关键零部件和基础元器件等中间产品，由于技术迭代快、产业生态复杂，长期依赖进口，而对自身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足，致使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缺失，许多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等问题，“卡脖子”的关键技



术成为“阿喀琉斯之踵”。

由以上分析可知，旧发展格局下的外循环模式存在的非均衡性带来了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国内市场长期被忽视，未能发挥大国大市场这一重要的竞争优势，本土的自主品牌和技术缺失，容易丧失发展的自主性。在自身发展瓶颈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夹击下，我国外循环模式需要发生改变，循环基础由低端要素优势转变为强大国内市场优势，循环的动力由国际市场驱动转变为国内市场驱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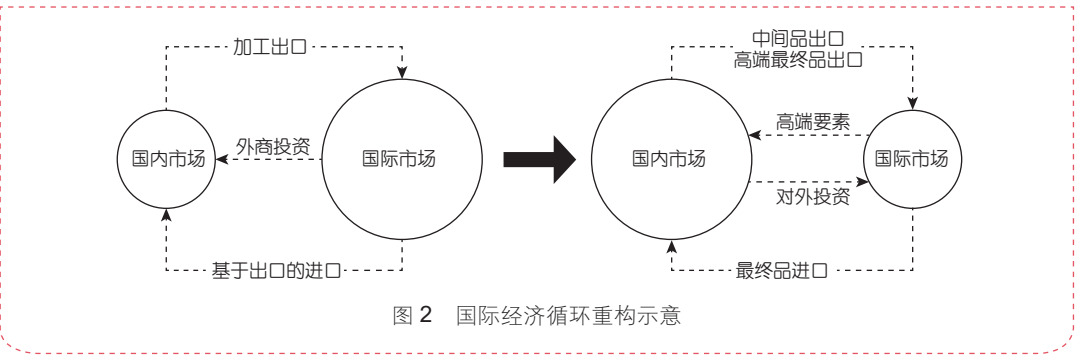
在新的国际循环下，我国将转变原有的国际代工模式，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掌握需求端的主动权，成为逆向外包的发包方（图2）。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比较优势将由低成本要素转变为强大的国内市场。而我国的大市场能否成为新比较优势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实现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即使存在潜在的需求规模优势，但是由于市场分割而不足以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空间，那么市场优势就无法转化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实施了较为充分的对外开放，但是对内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依然存在一些垄断行为所造成的国内市场分割，阻碍市场规模优势的实现。这

些垄断行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具有“准市场主体”地位的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向市场的横向分权不彻底，常常越位管理，兼具市场监督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从而产生一些行政垄断行为。比如，各地政府为了争夺重大项目，进行政策扭曲，通过一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区域性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项目落地，人为构筑地方性的市场壁垒；为了追求政绩，盲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不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规划，导致地区产业同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或是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对本地企业予以各种优惠或补贴，滥用行政权力为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的竞争设置障碍，甚至干预司法公正，偏袒本地企业，为其牟取利益。虽然表面上各地都从分割市场中获益，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却为此付出了规模不经济的代价，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陷入了地方市场分割的“囚徒困境”（陆铭和陈钊，2009）。

二是具有市场势力的垄断企业。在我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凭借其特殊身份所带来的资源溢出效应，在融资渠道、融资成本、项目审批、市场规模等方面享有优势，具有较强的市场支配地位，而民营企业常常在市场竞



争中面临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进入壁垒；也有某些因为掌握关键生产技术或市场销售渠道而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利用其市场地位压榨国内的横向和纵向关联企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还有一些具有网络平台控制能力的平台型双边垄断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及相关法规的漏洞进行不公平交易，对中小企业及消费者进行双重压榨，有损整体的社会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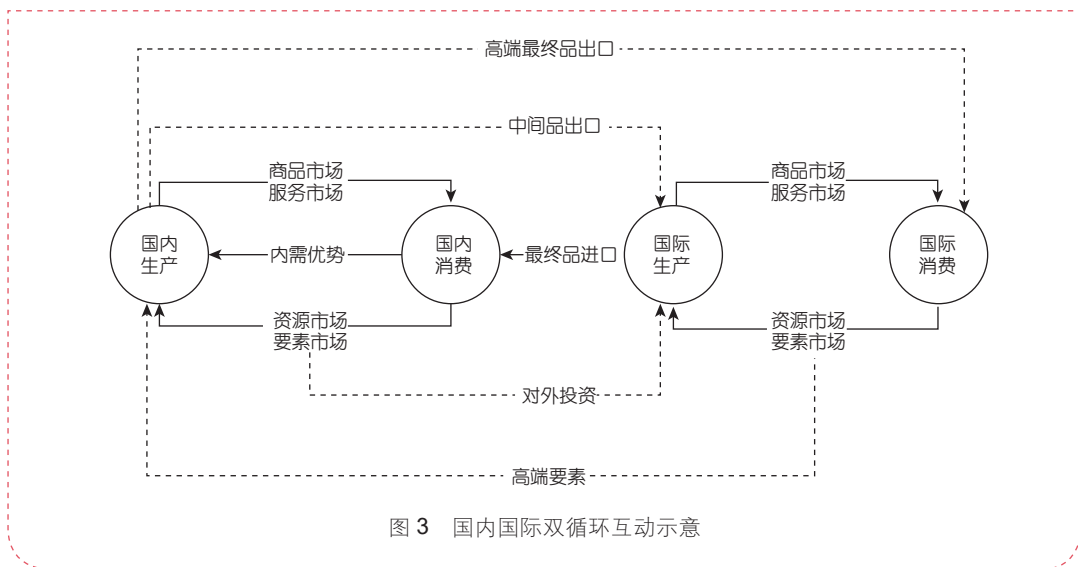
国内市场的分割和行政垄断行为不仅扰乱了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也制约了企业的国内市场规模，增加了额外的交易成本，迫使大多数民营企业只能选择依赖廉价要素的低端环节进行生产，造成国内产业链高端环节的缺失。因此，只有实现充分的对内开放，才能广泛激发不同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和创新动力，依托国内市场培育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要在充分竞争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各地区市场间、各专业市场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开放、相互协调的有机的市场体系。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打造统一的资源要素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基础，降低平均生产成本；通过破除妨碍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这些都有助于企业利用本土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形成新的成本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构建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和高度对称的市场信息共享渠道，并加强技术、数据、能源、生态环境市场培育力度，完善市场体系下传统要素与新兴

要素的融合衔接机制，为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提供要素支撑和制度保障。创新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有助于扩展企业生产的技术边界，形成本土创新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推动消费品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搭建中国品牌发展交流平台，提高中国品牌影响力和认知度，能够进一步培育本土企业的品牌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促进国内价值链的形成及提高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不同产业能够按照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布和集聚，本土企业在嵌入国内价值链的基础上以产业链集群的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由单个企业的比较优势转变为产业链合力的国际竞争优势。

四、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内外循环互动的主要动力

根据 Melitz (2003) 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高生产率的企业会选择出口，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则选择国内市场。但是一系列的经验研究（李春顶和尹翔硕，2009；lu et al., 2010；范剑勇和冯猛，2013）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却显著低于内销企业，被称为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出现这一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内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朱希伟等，2005；盛丹，2013）。Melitz 模型的一个隐含假定是国内市场是一体化的，企业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成本要小于出口。但由于存在国内市场分割，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大于国际市场，因此低生产率的企业会选择更低成本的出口，而高生产率企业才选择国内市场销售。这种扭曲现象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量民营企业从事低成本环



节的国际代工，且容易被长期锁定在代工的低端环节，难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由此可见，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发展格局下，原材料来源和产成品销售主要依赖国际市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未能形成有效的衔接和互动。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是更高水平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更好地互动联通。这就需要建立两个循环之间的逻辑联系。一方面，国内循环要能够带动国际循环；另一方面，国际循环要有助于促进国内循环。图 3 简要刻画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动逻辑。

从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的角度看，由于参与经济循环的微观主体是企业，要想两个循环互动，需要本国企业首先参与内循环，在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基础上，再参与外循环，形成内循环外溢式的外循环。由分工理论可知，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根据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引发内生的生产效率优势，且这种优势与分工水平相互促进，而贸易的开展既取决于内生的生产率，还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效率。Krugman (1980) 提出的母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 也证明了，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产品多样化的前提下，一国出口其国内市场需求较大的产品，因为本地市场的大量需求能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可以从中获得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竞争优势。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还能通过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激励本土企业创新 (Acemoglu et al., 2004 ; Aghion et al., 2013)，培育更多的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企业，从而有助于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并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创新链和价值链。由此可见，本国企业需要一个大规模、充分竞争、低交易成本的本地市场土壤，以此培育出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进而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实现由内而外的循环联通。

从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的角度看，新发展格局下的外循环是要服务于更高质量的内循环，满足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需求

求。外循环的形式包括进出口和利用外资及对外投资。在原有的循环模式下，我国主要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加工出口最终产品，国内的外资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高度重合，对外投资规模小，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房地产等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与国内需求市场相脱离。当发展格局切换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情形下，国际市场要为我所用，以国内需求为立足点，吸引全球的高端要素参与国内生产满足国内需求，同时供应全球，为本土产业升级提供置换空间。本土企业成为离岸外包的发包方，整体的外循环方向由西向东转移。要实现这样的结果，需要本土市场具有高效的资源配置功能，对外部要素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向内集聚创新资源，推动国内的产业结构高端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商品和服务市场的高水平统一，激发本土需求规模的提升和需求质量的升级，推动市场需求向高端化、多元化、个性化方向转变，不仅能够带动本土供给结构的升级，且能够吸引国际高端产业资本的进入，形成内循环对外循环的拉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有效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能够虹吸大量技术和人才等全球高级要素和资源的集聚，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升级，进一步促进国内高端需求规模的扩大，形成内循环对外循环的引力 and 外循环对内循环的支持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统一的市场基础设施、市场规则和市场监管，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在市场规模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综合作用下，能够培育出我国参与国际竞

争合作的成本优势、创新优势、品牌优势、产业链优势等一系列新优势，形成内循环对外循环的推力。

五、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取得了成效，但全面建成新发展格局任重道远。无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还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都离不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支撑、保障和驱动。当前我国内循环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之一是要素市场分割阻碍了资源在地区间、城乡间、部门间、不同市场主体间的有效配置，因此，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在要素和资源市场中，与新经济紧密关联的技术和数据要素，因其可以与其他要素相融合，创造“数据红利”优势加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故此技术和数据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应该先行。在市场基础制度与规则建设中，知识产权保护是技术和数据市场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因而建立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该是眼下的重点制度建设领域。

重构国际循环，必须依托本土市场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充分开放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内涵之一，不仅是指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对内开放进一步推动对外循环，通过对外开放获得资源要素补给内部循环，内外循环系统不断进行能量交换，实现国内循环主力驱动和国际循环辅助驱动的双轮驱动式经济循环模式。^[N]

学术编辑：韦燕春



参考文献

- [1] 范剑勇,冯猛.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之谜:基于出口密度差别上的检验[J].管理世界,2013,(08):16-29.
- [2] 李春顶,尹翔硕.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J].财贸经济,2009,(11):84-90+111+137.
- [3] 刘瑞翔,范金,戴枫.沿海地区与内陆省份经济增长的比较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06):148-168.
- [4] 刘志彪,凌永辉.在主场全球化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前提、重点任务及政策保障[J].产业经济评论,2021,(06):5-13.
- [5] 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J].探索与争鸣,2020,(07):42-49+157-158.
- [6] 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J].经济研究,2009,44(03):42-52.
- [7] 盛丹.地区行政垄断与我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J].产业经济研究,2013,(04):70-80.
- [8] 王宋涛,温思美,朱腾腾.市场分割、资源错配与劳动收入份额[J].经济评论,2016,(01):13-25+79.
- [9] 王晓东,谢莉娟.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J].中国社会科学,2020,(06):72-93+206.
- [10] 巫强,刘志彪.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分析[J].经济研究,2009,44(06):83-93.
- [11] 杨新铭,刘洪愧.要素资源错配、供给效率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J].求是学刊,2022,49(06):40-50.
- [12] 张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J].经济研究,2010,45(08):29-41.
- [13] 朱希伟,金祥荣,罗德明.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J].经济研究,2005,(12):68-76.
- [14] 邹薇,袁飞兰.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8,(02):5-23.
- [15] Acemoglu D,Linn J.Market size in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4,119(3):1049-1090.
- [16] Aghion P,Reenen J V,Zingales L.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1):277-304.
- [17] Bhaduri A,Marglin S.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14(4):375-393.
- [18] Krugman P.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5):950-959.
- [19] Li P,Lu M.Urban systems: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J].China & World Economy,2021,29(4):35-62.
- [20] Lu J,Lu Y,Tao Z.Exporting behavior of foreign affiliates: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0,81(2):197-205.
- [21] 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 [22] Schmookler J.Economic sources of inventive activity[J].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2,22(1):1-20.

Enhancing the Power and Vitalit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by Building a Nationally Unified Market

DAI 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To create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that is highly efficient, standardized, competitive, fair, and fully open. This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of unimpeded flows of commodity factor resources on a wider scale. At present, the creation of a unified market for factors and resources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Within these critical area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nd data markets should take prior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market systems and rules, a key focus for the near term should be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Keywords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Inner Circulation, Outer Circulation, Dynamics

JEL Classification E60 E61 F44